

十九世纪俄国古典小说中的“童年回忆性书写”论

夏 益 群

(湖南商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 小说家对童年回忆的言说,是立足于成人现在的时空对过去时空的一种再现。现在的时空与童年的时空相联系,共同构成了回忆过去照亮现在的艺术世界,获得一种超越历史的具体性和生存的本体性的理想模式。19世纪40、50年代俄国古典小说中的“童年回忆性书写”既注重文学的社会历史性和批判性,更着重于自我生命意识、人性意识的叩问以及诗性意识的追述。

[关键词] 童年回忆性书写; 本体; 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5-0101-05

据 A. Бушмни 编的《俄罗斯小说史》两卷本所析,19世纪40、50年代“俄罗斯和国外对回忆录、自传、笔记、随笔,一般而言,对那些所有可能纪录性的体裁,出现了极大兴趣”^[1]。“童年回忆性书写”也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学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小说童年回忆题材,最初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穷人》中。《穷人》中瓦连卡对童年的眷恋只以片断信件的方式出现在小说文本中,在此之后的40、50年代的小说就直接以“我”的童年回忆来构造文本。托尔斯泰的《童年 少年 青年》自传体三部曲,阿克萨柯夫的《学生时代》、《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和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都包含有作者对自己童年成长回忆的自传言说;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涅朵奇卡·涅兹瓦诺娃》、《小英雄》,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初恋》也是以“我”作为叙述主体回忆童年往事的小说。这些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叙述特点:以“我”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展开对“我”童年往事的追述,这种童年回忆性书写并不限于作家对自我童年的回忆,强调的是一种独特的与童年相关的生命意识的追忆性言说,以书写童年的记忆、个体成长等为主题,不仅积淀了作家更多的真情实感与经验的内容,也表现了作家对自我生存的肯定、对世界的乌托邦化的重新阐释。因为这种“童年回忆性书写”是个体对童年往事的追怀,所以

它带有明显的非社会政治性、超功利性和隐私性。在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评19世纪40、50年代俄国文学强大的社会批判功能的语境下,下文试图在着重分析这种“童年回忆性书写”的社会历史性和批判性的同时,更着重于自我生命意识、人性意识的叩问以及诗性意识的追述,深入小说文本腹地做一次心灵的旅行与思想的碰撞。

19世纪40、50年代俄国古典小说中的“童年回忆性书写”,既非单纯地是一种“向后看”的思维取向,即沉醉对过去的乌托邦式的想象;也非“向前看”的意向,对光明和未来的追求以及创造精神的发扬,对重获生命力的渴望^{[2]5}。而是一种“向后看的当下”的取向,“看”儿童过去那个“当下”时段的主体性,“看”过去时段“当下”的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对照。当然,这种“当下”是指“我”所回忆的童年时期,即文本所叙述时段的那个当下,着重于确立儿童的主体性、对儿童个体生命内部及成长的探索和思考,并非对童心的刻意推崇、对童年的刻意地深情追怀、对童年的梦幻和情趣的刻意寻求。向前看的激情与向后看的温情,更多的是表现作者言说自我的叙事策略,而往往忽略了对儿童自身主体性的尊重。19世纪俄国古典小说家的这种极富特色的童

[收稿日期] 2011-06-21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外语科研联合项目“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儿童形象研究和儿童教育”资助(编号:2010WLH27)

[作者简介] 夏益群(1974-),女,湖南益阳人,湖南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年回忆书写表面上看来是一种“退守个人”的写作姿态,其实质是在个人的童年主体尊重中重显其文学的社会历史使命,这也是谭桂林先生在对中俄两民族童年母题文学对比之后而深感俄国文学优于中国文学之所在,也是其期望之所在。中国文学中的童年书写负载的东西太沉重,不仅有对自我人生的思考,还要以之来构建民族精神、重塑人类生存方式的理想形态,实现对人性之真的拯救、对充满功利性的社会之拯救、对失去本体之美的文学艺术的拯救,试问其童年的主体性何去呢,儿童的本体性又何去了呢?其欠缺的也正是俄罗斯古典文学中这种童年回忆性书写巨大的艺术魅力。那么,这种艺术的力量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19世纪40、50年代俄国古典小说“童年回忆性书写”存在于俄罗斯的自由思想、对人自身生命意义的追问的大背景中来突显“童年回忆性书写”独特的美学价值。

从19世纪20年代始,十二月党人等贵族革命家以及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积极地对“自由”、“民主”的思想进行传播。俄国文学家源于一种俄罗斯人豪放不羁地对自由的渴望,对自我生命个体的自由的渴望,在文学中对自我的本体进行探寻。“在普希金看来,自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信仰,更是一种个性生命意识。他渴望以富于激情与创造力的自由个性来对抗俄罗斯文化的停滞与麻木。”^{[3]27-28}“进入19世纪亚历山大一世改革时期,自由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主张,还是一种对个性的追求。这与俄罗斯文化在19世纪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3]34}19世纪俄国古典作家正是在俄罗斯对个性追求的自由中,展开了对人主体性的尊重与言说。而普希金也就“成为自由理念从先知先觉者向普通民众深入的桥梁”,在其创作中表现出强烈地“以自由个性对抗上流社会的空虚与麻木”的人物形象,在其人物塑造中体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在这种生命意识当中,俄罗斯文学着重于表现人类心灵的悸动和灵魂的震颤。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在现代欧洲文明与俄国文化中动荡不定时的心灵犀动,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在寻觅自由时苦苦挣扎的心灵之路,无一不是19世纪俄国文学对人之自我存在的一种追问和探寻,其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

人类的童年是人生命的起点,在俄罗斯文学质询人之存在的思考中,兴起于19世纪40、50年代的“童年回忆性书写”也必然成为俄罗斯文学对人之存在思考的一部分,但并非是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的成人生存的求索,而是对儿童

是什么、儿童在思考什么、儿童精神是如何成长等诸多关于儿童自身问题的确立与书写。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但并非只强调文学是关于成人的文学,它也同样包括关于儿童的文学,因为儿童也是具有独立生命个体的人,而非缩小的成人,并非成人世界的附属品。当然这种关于儿童的文学其叙述的主体还是成人,无疑打上了成人思维的烙印,但其对儿童主体性的最大程度上的再现,也是小说文本艺术魅力的最大程度上的呈现。“童年是一口存在的深井。”^{[4]144}在这口井中,每个人以回忆的形式打捞着属于自己的那份怡然与自得。

二

19世纪俄国古典作家笔下的“童年世界的诗意刻画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本身,社会批判的主观愿望不能也没能干扰或者消弱对童年主题的揭示,而是与童年主题的揭示渗织化合在一起。”^[5]俄国“童年回忆性书写”更注重童年的诗性化再现,以及主体“我”的精神成长,心灵的犀动。

19世纪40、50年代的“童年回忆性书写”首先着重表现的是童年回忆中“我”自身的状态,即“我”作为一个儿童本体的生存状况。无论是托尔斯泰《童年 少年 青年》中的小尼古连卡,阿克萨柯夫《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中的塞廖沙,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的“我”,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英雄》中的小男孩,还是屠格涅夫《初恋》中的“我”,甚或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涅朵奇卡·涅兹瓦诺娃》中的同名主人公,作为作者童年回忆性书写下的这些孩子们更多地是表现其心理的变化。虽说涅朵奇卡在和母亲、继父穷音乐师生活一起的生活是穷困潦倒的,但这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意重在表现“我”回忆时心灵的痛苦,而不是对食物的饥饿感、对物质匮乏的挫败感。不仅如此,当涅朵奇卡母亲去世后,她先后被两家贵族收养,可以说是衣食无忧。也就是说,童年的“我”精神上的需求大于物质上的需求,也正是这类书写于儿童形象的独特之处。这些物质生活优越的孩子们到底是如何度过童年时期的呢?他们又在思考些什么呢?他们的精神是如何获得成长的?他们又是如何看待成人的世界的?这也是童年回忆性书写重在表现的地方。

19世纪40、50年代俄国古典小说中的孩子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多情、敏感而脆弱,用一双稚嫩的小眼睛打量和感受着成人的世界。正如果戈理在《奥勃洛摩夫》中所言,“孩子用锐利敏锐的眼光,观察着大人们干什么,……任何一件不相干的小事情

都逃不过孩子的敏锐的注意”^[6]。涅朵奇卡并不是因为生活贫困而痛苦,却因为父母之间的争吵带给“我”“全部童年一层阴暗而怪诞的色彩”。她幼小的心灵时常为“苦恼和愉悦而感到烦闷”,充溢着的是“恐惧、困惑和疑虑”。当涅朵奇卡来到米哈伊洛夫娜家为了掩盖真诚善良的米哈伊洛夫娜与情人过去的故事,一向孤僻而爱幻想的她挺身而出,但终究也挽救不了米哈伊洛夫娜的生命。这部陀思妥耶夫斯基未完成的小说再现的就是“我”对成人世界的感受。其短篇小说《小英雄》中的“我”快满11周岁时被送到莫斯科郊外的村子里去,暂住在一位名叫T的亲戚家里。在这家亲戚欢腾、热闹的排场后面,“我”不禁为一些“我”从未见过和听到的事情大为震惊,以一颗童稚之心为避免M夫人被世俗势力所吞噬而尽童稚之力。屠格涅夫《初恋》中的“我”对父亲无法亲近的爱与欣赏,对齐娜伊达的初恋,以及对父亲与齐娜伊达间微妙关系的了解,都在作者的内心世界里毫不张扬地展开。在托尔斯泰、阿克萨柯夫、赫尔岑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中,儿时的“我”在不断地观望成人生活中逐渐长大。托尔斯泰《童年少年青年》中“我”对德国教师卡尔·伊万内奇的热爱,对母亲的依恋,对苦行僧格利沙的偷窥,对女管家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的敬爱,无一不在“我”的童年回忆中体现。不仅如此,“我”“孤独的灵魂”还时不时思考着一切有关人类使命、未来生活和灵魂不灭的抽象问题,甚至我还意识到,生活在世界上并不是一切利益都以我们为中心,还有别的人、另外的生活存在。阿克萨柯夫笔下的塞廖沙更是以一个小孩特有的灵性感受着成人世界人与人的关系,母亲父亲之间的关系,母亲和农奴、仆人间的关系,父亲与农奴的关系,甚至那些悲惨的农奴与凶狠村长的关系等众多纷繁复杂的成人关系。赫尔岑称《往事与随想》为自己的回忆录,说其是以“‘自白’为中心,为了自白,到处从往事搜集断续的回忆”^[7],但是集中起来也表现了作者的深意。作品中童年的“我”的生活不仅与我的女仆、佣人联系在一起,还与社会历史相联系。在小说中“我”对政治,对亚历山大一世、对尼古拉一世都有自己的看法,我甚至渴望能与别人畅谈我的思想和我的憧憬。孩子们的敏感是大人意想不到的,“我”对父亲与母亲,父亲兄弟间的关系的敏感也是一个成人所无法了解的。童年回忆中对童年时“我”感受成人的书写,以孩子纯洁的灵魂对成人的感受表现成人的世界,有利于突显儿童的主体性,剖析儿童心灵的成长过程,使小说文本更富有诗意和魅力。

“我”的童年成长过程中,一方面受着成人世界的影响,一方面也拥有孩子自己独立的王国:在大自然中的怡然自乐,与小伙伴们的深厚友谊。这是一种诗意化的童年回忆。“回忆是富于诗的品格的一种心智活动。”^{[2]85}回忆童年包含着一种对儿童生活的审美观照,显示着儿童超功利性的生命意识,带来诗性的艺术特质、思想主旨。这种极富诗意的童年回忆可分两个方面:一是对诗意的自然空间的回忆,一是对纯真的孩子们的友情的回忆。

童年的“我”生活在自然的环境中,可称之“自然之人”。托尔斯泰回忆儿时的“我”和家人一起去打猎时的情景:“农民们的谈话声,马蹄践踏声,车轮的辘辘声,鹌鹑快活的啼鸣声,始终在空中成群盘旋的昆虫的嗡嗡声,艾草、麦秸和马汗的气味,炽烈的阳光在淡黄色麦茬上,在远处深蓝色的森林上,在淡紫色的云彩上照射出万紫千红,或明或暗的色调,以及那飘在空中,或者伸展在麦茬上的白蜘蛛网,这一切我都看见、听见和感觉到。”^{[8]28}这种诗意性的画面在“我”的童年回忆中时时闪现。阿克萨柯夫笔下的塞廖沙更是醉心于乡村的一切:巴拉希诺村美丽的泉水,水中被称为“魔鬼的手指”的小石子,以及人类技巧最高体现的那个破破烂烂的磨子;塞尔耶夫卡鲜花盛开、香气袭人的翠绿的森林,欢乐的鸟儿的歌声,成群的蜜蜂和黄蜂的嗡嗡作响,无一不使“我”觉得“多么可爱呀!”赫尔岑笔下的“我”对瓦西里耶夫的乡村生活至今念念不忘:宅前那条绿叶覆盖的、漫长的林荫道;宅旁荒芜了的花园;细长匀称的小白桦。这一切都是“我”十一二岁消磨的沙滩和芦苇地。而《小英雄》中的“我”和M夫人之间最深的交往也是在大自然的瑰丽景色中展开的:太阳光芒四射,微风习习,每一朵花,每一根最小的草,仿佛散发着准备献身的馨香。屠格涅夫《初恋》中的“我”在别墅处所享用的自然的宁静和美丽与我心底最纯美的初恋共同构筑了一幅唯美的图画:在爽快、清凉的微风中,静静地躺在茂密的草地上,回味着那些接吻与情话,该是一件“我”童年最美的事情。儿童于自然的喜爱与陶醉,自然构成了一幅独具特色的儿童与景、情相合的诗意化情境。

童年生活回忆的诗意化不仅在诗化的大自然中,更在于孩子们纯真无邪的友情中。19世纪40、50年代俄国古典小说中的童年回忆性书写不是着重于孩子们之间的游戏与喧闹,而是着重于孩子们内心深处对友谊的珍惜与迷恋。《涅朵奇卡·涅兹瓦诺娃》中的同名主人公与小郡主卡加之间感情的深刻也是成人友谊间所无法比拟的。“我”对卡加

那种无法控制的爱,使“我”苦闷、抑郁。这种孩子之间被称为友谊的“爱”,时常灼烧着“我”幼小的心,甚至达到了奇怪的程度“我”会偷偷拿着卡加的手帕或扎辫子的丝带接连几个晚上,痛哭流涕地吻着它们。托尔斯泰《童年 少年 青年》中小尼古连卡对伊温家孩子中的老二谢廖扎独特的美而震惊,不禁被这个孩子给迷住了。“看见他就足以使我高兴;有个时期,我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到这种愿望上,隔三、四天不见他,我就感到寂寞,忧郁得要哭。我的一切梦想,不管是醒着还是做梦,都是关于他的。”^{[8]71}这种孩子间无限的热恋与崇拜,无疑给童年回忆带上纯真的色彩。赫尔岑笔下的“我”不仅有和表姐之间真诚的交往,还有与尼克之间真挚的友谊。“我”与表姐的交往是一种平等的对话,给“我”少年隐士生活带来温暖,使“我”的感情不致于在父亲的冷嘲热讽中夭折。“我”与尼克的交往是一种建立在共同信仰上的无比深厚的友谊。“我的狂热天性使我愈来愈倾倒在尼克面前,而他也悄悄地、深情地爱上了我”^[9]。童年回忆中孩子们的这种友谊更增加了童年回忆的诗性色彩。

阿克萨柯夫在《学生时代》中表达了对童年的热爱之情,“许多成年人都以粗暴而轻率的态度对待了它,以嘲笑或少年老成的教言糟蹋了它,——现在到哪里去了?幸福的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它的回忆,可以使老人的心坎感到欢乐,也可以使老人的心坎感到痛苦。有过幸福的童年,而且能在后来回想起它的人是幸福的!”^[10]童年回忆是作者生命力的源泉,精神的寄托,也更是对儿童主体性尊重的表现。

19世纪俄国古典小说童年回忆性书写更多的关注于儿童内心的精神生活。托尔斯泰在其作品中注重对人的内心活动的细致分析,在《童年 少年 青年》中小尼古连卡为外祖母过生日写了一首诗,家庭教师卡尔·伊万内奇送给外祖母一个镶金边的匣子,哥哥沃洛嘉献上了他画的土耳其人,而“我”却始终十分羞怯地献上自己的礼物。“当大家都走到十字架跟前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阵难以抑制的、令人变得傻头傻脑的羞涩,觉得再也没有勇气献上我的礼物。”带着这种羞怯的心情,“我连最后的一点勇气和决心都失掉了,我的羞怯达到了极点。”当外祖母因为眼力不济,将“我”的诗交给父亲去读的时候,“唉,此时此刻我的痛苦心情怎么来表达呢?我以为她这样做,是因为她不爱念这么拙劣的、写得歪歪扭扭的诗,是要爸爸亲自读最后那句清楚地证明我缺乏感情的诗句。”^{[8]60}托尔

斯泰生动地刻画了“我”给外祖母送上自己做的诗时的心情:由羞涩到羞怯再到沮丧,这种心灵的变动再现的是一个敏感而缺乏自信的儿童形象。阿克萨柯夫在《学生时代》中描写了一个对家庭极具依恋感、且极其孤僻的孩子塞廖沙在第一次上封闭式学校时丰富的内心世界。他看到兴高采烈地同学,却心理在想这些同学是不是没有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在乡下没有房子和花园。在教务长卡马谢夫几乎有点不近人情的教导下,“我”变得沉思默想了,我总是在功课的闲暇思绪一下子飘到布高鲁斯河畔乡下的“天堂”,想象着家中的情况,揣摩着对母亲的思念。阿克萨柯夫以“我”回忆的形式描写了一个孩子受到压抑的、痛苦不堪的内心世界。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描写了“我”从仆人那里听到了关于父母关系后内心里产生了对父亲的疏远感,对造成母亲的不幸的内疚笼罩了“我”童年明朗的想象力。《涅朵奇卡·涅兹瓦诺娃》中同名主人公认真观察和倾听大人的每一句话,觉得母亲对父亲太严厉,对父亲有种近乎怜悯的母爱的心理,以及对自己家里为什么没有笑声和欢乐的困惑都是以“我”自白的形式得以表现的。《小英雄》中“我”对一位金发女士挑衅时的心理也真实地再现了一个小孩子的冲动和勇气:一股憎恨和报复的情绪涌上心头,“我”看着这位女士将目光射向“我”爱恋的M夫人时,仅仅就在一刹那,我心中的一闪念,犹如火药爆出的闪光,脑海里竟然出现美女、英雄、骑士比武的形象,当我驯服了一匹烈马胜利归来时,我看到M夫人竟然脸羞得通红,“只觉得这种感情使我非常尴尬和震惊”。一个小孩子的心理及其冲动的形象得以生动地再现。小说家们对孩子的心理再现,是对儿童主体性的尊重,同时也给整部小说增添了无限情趣和生机。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反驳有些人批评托尔斯泰《童年 少年 青年》三部曲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场景的表现时,是这样说的,“在这些小说里就没有战争的场面,没有意大利自然界风光,没有历史的回忆,总之也没有许许多多可能发生但是却不宜也不应当讲出来的东西:要知道作者要让我们转移到孩子的生活里去,难道孩子会理解什么社会问题?难道孩子会懂得什么社会生活?所有这种因素正象军营生活之类一样,都是和孩子的生活格格不入的。”^[11]车尔尼雪夫斯基还认为在描写童年时,就应当描写“有孩子的感情和见解的孩子”。19世纪俄国40、50年代童年回忆书写正是描写的“属于这种年龄所特有的因素”,从而使小说更具孩子的特色。

三

19世纪40、50年代童年回忆性书写在对儿童生活的回忆中带给我们文本的亲切感,真挚感和诗意情调。对童年的回忆“又宛如一种促使梦想的精神食粮,宛如一种来自非生活的恩惠以协助我们在生活的边缘生活片刻”^{[4]146}。在这种生活的片刻中,作家的心灵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而读者的心灵也同样得到了休憩。但是这种童年的回忆是一种超出所有功利性的回忆,它让我们找到“尚未被认识的存在”——孩子的心灵,在对孩子的心灵的阅读中,我们为这些孩子而感到惊讶。

“越是追溯过去,生活的情趣就越多。生活中的善越多,生活本身的情趣也越多。二者水乳交融,相辅相成。”^[12]在对童年回忆性书写中,在最充分表现儿童主体性的同时,生活中的善与情趣得以最大程度的发现。小说家对童年回忆的言说,是立足于成人现在的时空对过去时空的一种再现。现在的时空与童年的时空相联系,共同构成了回忆过去照亮现在的艺术世界,获得一种超越历史的具体性和生存的本体性的理想模式。19世纪俄国古典小说家的这些童年回忆性书写表明童年在小说中能更丰富地体现其历史性和诗性,既能体现人个体在社会环境成长的历程,也能体现人类童年美好生命的活力。作家在空灵而又深沉的回忆性文字中,不仅放入了某种希望,某个富于青春活力的想象,也同时注入了与时代背景无法剥离的现实因素。

[参考文献]

- [1] А. Бушмни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романа в двух томах [M].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64: 586.
- [2] 谈凤霞.“人”与“自我”的诗性追寻[D].南京师范大学年博士论文,2007.
- [3] 张铁夫.普希金新论:文化视域中的俄罗斯诗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4] 加斯东·巴什拉.梦的诗学[M].刘自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 [5] 谭桂林.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50-351.
- [6] 果戈理.奥勃洛摩夫[M].齐蜀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39.
- [7] 赫尔岑.赫尔岑论文学[M].辛未艾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128.
- [8] 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卷(童年 少年 青年)[M].谢索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 [9]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M].项星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76.
- [10] 阿克萨柯夫.学生时代[M].汤真译,北京:新文艺出版社,1957: 7.
- [11] 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下卷(1)[M].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272.
- [12] 托尔斯泰.伊万·伊利奇之死[M]//《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4卷 中短篇小说 1885-1910.臧仲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09.

“Writing of Childhood Memories” in the Russian Classical Novels of the 19th Century

XIA Yi-qun

(Hunan Business College,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Novelists' statement of childhood memories is based on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adults' time and space from now to pas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esent time and space and the childhood space-time, together constitutes the memories of the past to illuminate the art world, get a kind of ideal pattern beyond specific history and ontological survival. During the forties and fifties of the 19th century in Russian classical novels the “writing of childhood memories” paid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histor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and focused more on the life of self-awareness, awareness of the human nature of the inquiry and sense of poetry.

Key words: childhood; memories of writing; ontology; subjectivity